

亚细亚主义下的中日对象观

文/王锡东

摘要：中日对象观根据中日历史的发展来看，是由一方为主导的。在近代，两国的对象观经历了一次主导者的转变：由“华夷秩序”下中国主导中日认识逐渐转变为“大东亚共荣圈”下日本主导中日认识。一方为主导的中日认识本身就是不对等的认识，而主导者在近代的转变又加剧了认识上的错位，使中日两国的认识更为扭曲。本文通过对这一抽象过程的描述与梳理，深入剖析中日彼此认识错位的流变及成因。

关键词：西方影响；本国利益；中日对象观

中图分类号：D819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6-4117(2011)12-0167-02

近代中日的彼此认识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。首先，在西方文明的入侵下，华夷秩序被破坏，中国和日本的国家地位受到动摇，旧有的彼此认识已经不适合新的国际局势。其次，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物，中国和日本都进行了改革，双方对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影响了双方重建国际地位的能力。因此，甲午战争之后，两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完全逆转，中国和日本产生了新的彼此认识。中日间的彼此认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完成了转变的过程。新认识的产生具有双向性，认识主体不仅对外认识产生了变化，而且对自己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。中日彼此认识的错位随着

这种双向性而产生。笔者认为，中日两国在近代的彼此认识是有错位的，中国对自己的认识与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并不能一致，日本对自己的认识与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也不能一致。

中日认识上的错位并没有在甲午战争之后立即实体化，中日矛盾也并没有因为战争而立刻激化。中国秉承着对近邻的友好，依然信任首先强大起来的日本。而日本的自信心在战后过度膨胀，终于无限轻视了悠悠上千年的华夏文明。认识上的错位在延续拉大，此后两国对于亚细亚主义的不同理解更印证了这一点，认识上的错位与分歧继

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，使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地依赖国营经济。3、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。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、限制、改造的政策的同时，对资产阶级分子实行了团结、教育、改造的政策。对他们在政治上适当安排、工作上调动积极性、生活上妥善照顾，不但避免了激烈的阶级对抗，而且减少了改造的阻力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。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造，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，这是我们党创造的一种消灭资产阶级的独特方式。

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，结合我国具体实际，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，成功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。尽管短时间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，但这种使年轻的新中国尽快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之举，是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功绩。

三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——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的社会主义道路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发展，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发展是一致的。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大会。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；果断地停止使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，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。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，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新时期。1982年9月，邓小平在党的十二

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”1987年10月，党的十三大首次使用“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”这一提法，明确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和作用，阐述了这一理论的重要内容，系统回答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，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系列问题。因此在党的十三大初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。1992年10月召开的党十四大的主题是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，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”，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它反映了邓小平经济理论核心内容的确立，使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达到完整的形态。十四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开辟。此后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坚持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。

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，是不断与时俱进、开拓创新的历史。在理论上，我们既继承前人，又不断创新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。在实践上，我们既学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，又结合中国国情，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之路。进入新世纪，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，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，不断与时俱进，发展创新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。

作者单位：中共营口市委党校

作者简介：刘丽（1974—），女，汉族，辽宁省营口市人，中共营口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，研究生学历，长期从事党史党建理论研究工作。

续深化明显。

近代亚洲不断受到欧洲各国侵略,亚洲人民思考着该怎么解决亚洲被侵略的问题。日本作为亚洲的一员,在近代之初,先后打败了中国和俄罗斯,国家实力与地位随着国内的工业化逐渐增加,日本社会精英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,产生了救助亚洲的使命感。二十世纪初,日本的社会精英在使命感的推动下,提出各自的“亚细亚主义”。中国也在完成民族任务的同时,提出来自己的“亚细亚主义”。比较两国的“亚细亚主义”,可以看出两国对象观上的错位。

日本提出“亚细亚主义”有一个相同的前提,就是日本为东方的代表者,但却有两种内容,一种是从亚洲振兴的角度出发,批驳日本政府盲目追随西方强国。北一辉即是这种“亚细亚主义”的典型代表,他认为“拜倒于白人国家卑鄙之高利贷政策之下,而欲求的支那之信赖,此乃发狂之亚细亚之盟主也”,“日本地位应该是支那及其它黄种人独立自强之保护着、指导者,是亚细亚之盟主”,日本作为“亚洲觉醒史”的先驱者,获得盟主的地位,应当积极为“非为单纯之我利私欲,乃为其它民族之觉醒,排除占有者及侵略者耳,应将打破此种现状之行动视作正义”“若此(为它民族之觉醒的正义行为,笔者注)即为侵略主义、军国主义,日本则应……将之作为黄金之冠,加于自己头上”,“若有必要,应有夺取全地球之远大抱负”。另一种是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,主张利用“亚细亚主义”,建立一个真正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联盟。这种亚细亚主义的典型代表为大川周明。他认为“近代以来,亚细亚诸国大半沦为西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,东洋文化遭到了蹂躏”,只有日本才有资格拯救亚洲人民甚至世界。日本、中国、印度三国,在日本的心中已经成为一体,通过与西方侵略者开战就可以实现“亚细亚主义”。

这两种“亚细亚主义”虽然内容上有所不同,但是对中国认识的结果却是一致的。前者认为国家的独立是民族的觉醒,日本如何“保全”中国,归根到底要从中国自身的自立中去追求。在这种国家民族主义与使命感的感召下,如果中国不能觉醒,日本应当去夺取它所有的一切,并且这是正义的。后者认为在国家利益的前提下,“幸现彼大邦(中国)怯懦易与时,小邦者(日本)何不速取之。取之自福,取之自强”。并且,日本的“亚细亚主义”都认为日本应当是亚洲的盟主。这两种逻辑认识其初衷是否具有正义性,很难定性,但是从历史上来看,日本并没有承担起盟主的责任——从根本上帮助中国不受西方各国的侵略。最终这一类思想认识都被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引用为思想基础,亚洲振兴的事业则完全被利用,侵略中国是“亚细亚主义”逻辑认识下所作出的统一结果。

中国的“亚细亚主义”首先是对华夏文明的继承,下面以李大钊和孙中山为例,来说明中国“亚细亚主义”下对日本的认识。李大钊认为亚细亚主义应当以中国为核心展开,“诚以吾中国位于亚细亚之大陆,版图如兹其宏

阔,族众如兹其繁多,其势力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,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文明,此非吾人之自夸,亦实举世所公认。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,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,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。”日本如果也有大亚细亚的理想,首先“当承认吾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,倘或有外来之势力横加凌制,不惟不可助虐,且宜念同洲同种之谊以相扶持相援助,维护世界真正之正义,保障世界确实之和平。”因此,李大钊的“亚细亚主义”有两个内容,一为中国依然是亚细亚的核心,亚细亚主义必当围绕中华国家再造为主要任务;一为日本也应当以中华为亚洲大局的柱石,念在同色人种的基础上,帮助扶持中国抵御侵略。孙中山的“亚细亚主义”也类似的观点,但明确提出了“亚细亚主义”下,中国对日本的定位与期望。首先他肯定了日本民族独立的积极影响,认为日本独立是“亚洲复兴的起点”,日俄战争的胜利,“是东方民族打败西方民族。日本人打胜仗,我们当作是自己打胜仗一样。”其次,他认为亚细亚主义应当发扬中国的“王道”,而不是西方的“霸道”,“大亚洲主义”是文化问题,讲王道主张仁义道德,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。这才是大亚洲主义的基础。第三,大亚洲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是“为被压迫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”。因此,期望日本维新强盛之后,帮助中国革命,否则中日感情将日趋疏远。

比较“亚细亚主义”下的中日对象观,两者的彼此认识是不一致的。围绕“亚细亚主义”,两国的彼此认识截然相反。中国从历史上、文化上认为自己是亚细亚主义的核心,亚洲的振兴首先应该从中国民族独立开始,日本应当帮助中国,扶持中国。日本则认为自己是亚洲唯一独立的国家,应当在振兴亚洲中发挥主要力量,并且应该以日本为核心组成新的亚洲秩序,中国以及印度应该响应日本,而实际行动中却是赤裸裸的侵略。

因此,以“大亚细亚”为起点,中日的彼此认识逐渐深化、分化并作用于两国政府阶层。20世纪20年代前后,两国政府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进行着彼此的国家外交活动。日本一面向中国革命提供经济援助,一面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侵略中国利权,以大亚细亚主义为侵略开脱责任。中国政治家受到日本的援助,多少产生一种亲近的感情,联合日本达成目标的幻想从孙中山到北洋军阀都一直存在着。

作者单位: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

参考文献:

- [1]陈尚胜.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[M].山东:山东大学出版社,2008.
- [2][日]中村新太郎.日中两千年[M].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1980.
- [3][日]陈舜臣著.刘玮译.日本人与中国人[M].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9.
- [4]刘佳鑫.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[M].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2007.
- [5]谢寿光.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[M].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4.
- [6]孙雪梅.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——以直隶省为中心[M].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1.
- [7]史桂芳.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[M].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9.